

## 胡刻《文选攷异》为顾千里所作考

李 庆

“《文选》烂，秀才半。”《昭明文选》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地位乃人所周知。现最通行的《文选》刻本，是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翻刻的宋贵池刊本（以下简称胡刻本）。其后附录了署名“胡克家撰”的十卷《文选考异》，以其考核精博为人所重。近年，中华书局把胡刻《文选》及《考异》影印出版。亦持此说，笔者以为值得商榷。胡刻《文选考异》的作者，不是胡克家，其主要成于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千里之手，现考之如下。

### 一

首先，我们看一下顾千里与胡刻《文选考异》的关系。胡克家翻刊宋尤袤贵池本《文选》，主其事者乃顾千里。《清史稿·顾广圻传》、《养一斋文集》卷十一《涧菴顾君墓志铭》等言之甚明。而《文选序》及《文选考异序》均系顾千里代胡克家所撰。道光十八年上海徐氏校刊的《思适斋集》卷十载之，并注明“代胡果泉”，可以覆按。

顾千里治《文选》，并非一日之功。早在为胡克家校刊《文选》十余年前，他就曾以吴郡周锡瓚氏所藏的残宋本尤氏贵池刊《文选》校过他本。他在《文选（校宋本）跋》中云：

此《文选》朱笔校出汲古阁主人同时冯谥伯手。其前二十卷又有蓝笔，则陆敕先所复校也。今年秋八月，余属蕘圃以重价购之，复借乡严周氏所藏残宋尤袤槧本，即冯、陆所据者，重为细勘。阅时之久几倍冯、陆；补其漏略，正其传讹，颇有裨益。惜宋槧之尚非全豹也。（王欣夫先生辑《思适斋书跋》卷四）

其时在嘉庆元年十二月。在此《跋》中，他还说：

广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谬，兼由勘宋本而知即宋本亦不能无谬。意欲准古今通借以指归文字，参累代声韵以区别句逗，经史互裁者考其异，专集尚存者证其同，而又旁综四部，杂涉九流，援引者沿流而溯源，已佚者借彼以订此，未必非此学之功臣也。

可见，此时顾千里不仅用宋刊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，而且连如何进一步研究《文选》的方案都初步规划好了。我们把顾千里设想的方案和十卷《文选考异》对照一下，不难发现，二者有其内在联系。

又，《文禄堂访书记》卷五“《增补六臣注文选》六十卷”条下，录有顾千里的跋语：“嘉庆丁巳元和顾广圻重阅一过。”还录有阮元的跋语云：“顾涧菴校周氏藏宋尤袤槧本，校本”，其时在嘉庆十一年。这可以说明：一，顾千里在为胡克家校刊《文选》以前，校《文选》已非止一次。二，当时顾千里的校本，已被人所重视。故顾氏在嘉庆十三年间撰成《文选考异》，决非偶然。

事实上，在现存的大量顾千里手校本，过录顾千里校本以及刊行的顾氏校勘著作中，有着许多可以和十卷本的《文选考异》中内容相印证的材料，现择其一二，对照如下：

其一，复旦大学藏顾千里手校孙志祖著《文选李注补正》卷一，《西征赋》“明三败而不黜”注“言三未详”条，《补正》曰：

许云，案彭衙之败，在文二年春。是年冬，晋及宋、郑、陈伐秦，

取汪，及彭衙而还，是亦晋胜秦败。并前穀之役为三败。

顾千里朱笔批云：

考此役秦未尝及晋师战，其非孟明将而败不待言。何得强取以足三败耶。戊辰十一月。

又用墨笔批云：

古人读书自有义例，末策乃侈口妄议，切戒之。

胡刻《文选》此条下有注云：“又曰，晋先且居伐秦，斯三败矣。”《考异》云：

善明云止三败，言三未详，更不得有此。当是或驳善注而记於旁，尤延之不审，取以入注耳。考此役秦未尝及晋师战，其非足三也。於此可知善义例之精矣。

可见，顾千里手校本与胡刻《文选考异》不仅观点完全相同，且用语亦相类。

其二，复旦大学藏王欣夫先生过录顾千里批校本孙志祖著《文选考异》。卷四《过秦论》“遁逃而不敢进”条下，善原注：“《史记》作逡巡遁逃。”孙氏以为：

《匡谬正俗》云，逡遁而不敢进。遁者，盖取盾之声以为巡字，当音详遵反。……后之学者既不知遁为巡字，遂改为遁逃，……且书本好者今犹为逡遁，不作遁逃也。

顾千里批云：

善从遁逃，（小字注：明文在《西征赋》注。）颜从逡遁。借侍御未足以语此矣。

胡刻《文选考异》卷九“注。《史记》曰逡巡遁逃”条下云：

袁本、茶陵本作“遁逃，《史记》作逡巡。”案，二本也是。“遁逃”，复举正文。“《史记》曰逡巡”，五字为一句。善所见《史记》作“逡巡”，而今本作“逡巡遁逃”。后人妄添二字，尤反依之改转，误之甚者也。《贾子》作“逡巡”，正与善所见《史记》同。又案，正文作“遁逃，《西征赋》注引作逡逃。”必善读《汉书·陈涉传》如此，故载《史记》之异。意谓两文俱通……然则作“遁逃”

自无不可，未见潘安仁必误，如《匡谬正俗》所讥也。师古《汉书》专主“逋遁”，即其所谓“遁者，盖取盾之声以为巡字，当因详遵反。学者既不知遁为巡字，遂改为遁逃”者。与善全异，不可用以校此。

很显然，这正是驳孙志祖《考异》中的观点，也正是对前面所引顾千里批语中看法的具体阐述。

其三，同上书卷一《神女赋》条目下，孙志祖《考异》云：

赵曦明云，二赋，《高唐》之末曰“王欲见之”云云。《神女》之起曰“其夜王寝，果梦与神女遇”，上下紧相承接。岂得欲见者是襄王，入梦者反不是襄王而是宋玉？《容斋五笔》所载，其谬固有不待辨而可明者。

其下，顾千里批云：

今考得五臣本与善本王、玉字相反。自来所说，沈存中、姚令威大旨已得，但欠细分析。

而胡刻《文选考异》卷三“其夜王寝”条云：

陈云，王寝白玉诸字，当如沈存中，姚令威之说。案，何校亦云然，谓玉、王互讹也。说载《笔谈》及《西溪丛语》。今考互讹始於五臣，见下。

在“玉曰”条下云：

袁本，茶陵本“玉”作“王”。云，“善作‘玉’。”案，二本与尤正同。然则善，五臣“王”、“玉”互换，此其明验也。自“王寝”以下及“王览其状”，皆当如此。二本校语不备，尤本亦多以五臣乱善。赖存此一处，可以推知致讹之由，为沈存中，姚令威疏通而证明之，读者亦可以无疑矣。

这二者一脉相承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此外，顾千里所校《文选理学权舆》卷二，云《甘州记》书名有误（顾校本现存复旦大学）；顾千里校《淮南子》卷十三，认为《文选》中注《魏都赋》者当是张载（复旦大学藏王欣夫先生过录顾千里校本）；顾千里以为《魏都赋》“裘偏整以贯列”条

下的李善注衍一“列”字，认为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凡言“然”者，即今之人言“然则”之意（见《说文辨疑》）等等，都可以在署名胡克家的《文选考异》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内容。这当然不会全是偶然的巧合。

事实上，顾千里自己也说过，他曾作过《文选考异》。（见顾千里校《文选李注补正》卷一。）据上所述，顾千里所作的《文选考异》，当即是署名胡克家者。

## 二

为了进一步证明胡克家的《文选考异》系顾千里所作，让我们来看看段玉裁的有关论述。胡刻本《文选》及《考异》刊布后，段玉裁写了一封信给陈鱣。对顾千里所作的《文选考异》进行了抨击。（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二《与陈仲鱼书》。）段氏此信的具体时间，《集》中未注明，但大致可以考得。此信载于《答绍武书》之后，《吴都赋蕉葛竹越解》之前。此卷之文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。《答绍武书》中云：“愚为年高，诚七十有四矣。”段氏生於雍正十三年，“七十有四”，当为嘉庆十三年。《吴都赋蕉葛竹越解》注明作于“庚午中秋日”，乃嘉庆十五年，则《与陈仲鱼书》当作于此其间。正胡刻《文选》及《考异》刊行之时。

段玉裁在信中对顾千里撰的《文选考异》提出了四条异议。为了说明问题，不妨将段氏信中所论及顾千里撰《考异》中的有关文字与胡氏《文选考异》对照一下：

### 段氏信中文字

《文赋》“故蹉踔於短垣（段氏原注，今各本作韵，尤延之作垣），放庸音以足曲。”李注，“《广雅》曰，蹉踔，无常也”云云。“《国语》曰，有短垣君不踔。”顾千里云，袁本、茶陵本作韵，不著校语。注中《国语》曰九字，各本亦无之，恐尤改，未必是也。

### 胡氏《文选考异》

袁本、茶陵本垣作韵，不著校语。案，注中“短垣”语二本亦无之，恐尤改，未必是也。（见卷三“故蹉踔於短垣”条。）

《蜀都赋》“演以潜沫”，（段氏原注：《蜀都赋》本作演，与演别，千里不能正。刘渊林注曰，《禹贡·梁州》云，沔潜既道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，至梓潼汉寿县，入大穴（原注：俗本无大字，千里不能正。）通岡山下，西南潜出，今名伏水（原注：俗本伏作複），旧说云，禹贡《潜水也。千里云：汉中二字不当有，沔阳当作江阳……。

案，“汉中”二字不当有，“沔”当作“江”。（见卷一“注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。至梓潼汉寿县”条。）

又：段氏文中注明顾千里“不能正”的文字，现胡刻本《文选》俱如段氏所云。

《吴都赋》“其竹则篔簹竹於桂箭射筒”。渊林注云，射筒，竹，细小通长（段氏原注：当作通中），长丈余，亦无节，可以为射筒。筒及由梧，皆出交趾九真。（段氏原注：“筒”上夺“射”字，千里因之生误。）千里不知夺一“射”字，以射“字”乙置“筒”字下，云，“射筒”当作“筒射”，各本皆倒，“筒”句绝，“射”下属。此但可以为“筒”耳，非单名筒也。

又《吴都赋》“楠榴之木”渊林注云，楠榴，木之盘结者，其盘结节文尤好，可以作器，建安所出最大长也。千里云，“楠”当作“南”，“南榴”复二字为一木名，与柟之别体作楠无涉，误也。

案，“射筒”当作“筒射”，各本皆倒。“筒”句绝，“射”下属。详刘注意，篔簹也，林箴也，桂也，箭也，射筒也，由梧也，纂也，筭也，凡八竹。此但可以为筒耳，非单名筒也。（见卷一“注可以内射筒，筒及由梧竹”条。）

案，“楠”当作“南”，注中作“南”各本皆同。袁，茶陵二本“楠”下有南音。盖五臣“楠”而乱之。南榴，复二字为一木名，与柟之别体作楠无涉，五臣误也。（卷一“楠榴之木”条。）

通过以上对照可以看出，段玉裁指责的顾千里所撰的《文选考异》，即是现在署名胡克家所撰者。至于段氏引文略有出入，殆因段氏书札行文，未必逐一详核原文所致，不足为怪。

值得回味的是，与段、顾二人俱有交往的陈鱣，曾把段玉裁

的指责转告给顾千里。千里亦有信给陈氏，这就是现载于王欣夫先生辑《思适斋集补遗》卷二的《与陈仲鱼孝廉书》。在信中，顾氏表示不愿与段氏纠缠。可设想一下，如果段玉裁张冠李戴，把明明是胡克家撰的《考异》，算到了顾千里的头上，大加非议，而此时顾、段二人又正值交恶之际，顾千里怎会不加以说明？而当时欲作二者解人的陈仲鱼又何至于跟着闹笑话？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。

### 三

以上，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胡氏的《文选考异》出自顾千里之手。下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说此《考异》不可能是胡克家所作呢？

细观《文选考异》可知，它是以尤袤淳熙辛丑的贵池刊本为底本，参核吴郡袁氏本、陈氏茶陵本，并对照了何义门、陈景云师生的批校语，广征博引而成。功夫甚巨，断非一、二年猝然可成者。而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，就是要有一个尤氏刻本。但尤氏宋刻本，在嘉庆之际，亦属稀见之物。那么，胡克家是何时见到此尤氏所刻的宋本《文选》呢？现有两条资料可以说明。

其一，胡氏《文选序》云：

往岁，顾千里、彭甘亭见语，以吴下有得尤槧者。因属两君 遴手影摹，校刊行世，踰年工成。

此序作于嘉庆十四年二月，故可知胡克家系从顾、彭处得知吴下有尤槧本。

其二，黄丕烈《重雕曝书亭藏宋刻本〈舆地广记〉缘起》云：

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。欲举所藏而次第刻之，力有所不能也。会鄱阳胡果泉先生典藩吴郡，敷政之余，留心选学，闻吴下有藏尤槧者，有人以余对。遂向寒斋以百金借钞，盖酬余损装之资，而实助余刻书之

费，洵美意矣。

从以上可知，胡氏得见尤袤刻本，乃是在到达苏州任布政使之后。据《清史列传·大臣传》次编八卷三十三《胡克家本传》云，胡氏于嘉庆“十一年迁江苏布政使，十四年二月兼署江苏按察使。”又据《清代职官表》所载，胡氏为布政使时在嘉庆十一年五月。故可断定，胡氏借钞尤刻《文选》的时间决不会早于此。

再考顾千里行迹。他自嘉庆十年八月回家省母后，一直寓居于江宁，为孙渊如、张敦仁校刻书籍，直到嘉庆十二年冬方返回苏州。江标所著《黄尧圃年谱》云：嘉庆十二年“十一月五日，先生往候顾涧菴，时顾方从江宁归也。”赵诒琛《顾千里年谱》所载同。在此之前，顾氏无机会在“吴下”见到胡克家。再对照《文选序》：“踰年工成”之言，胡氏见到尤刻《文选》的时间，当系在十二年冬，顾千里回到苏州之后。

从嘉庆十二年冬到十四年二月，胡克家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，要利用“敷政之余”的闲暇，校完《文选》，并旁征博引，洋洋洒洒地写成几达二十万言的《考异》，似乎是颇为其难的。

此外，现存的两种原始的胡克家传记，清史馆所存的《传记》和冯登府所撰的《神道碑》中，对胡氏的行迹记载颇详，但俱未言《文选考异》为其所撰。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疏漏，可作为《文选考异》非胡克家所作之旁证。

#### 四

如果说胡克家的传记中未记载他撰过《文选考异》，但在当时以及以后关于顾千里的材料中，却有不少这样的记载。现摘其部分如下。

李兆洛所撰的《涧菴顾君墓志铭》中云：“为胡刻宋本《文选》，元本《通鉴》”，“每一书刻竟，综其所正定者为考异，

或为校勘记於后。”（《养一斋文集》卷十一）

曾经师事过顾千里的梅曾亮于道光五年作诗云：

吴郡顾千里，儒林得大师。病犹思误字，醒亦好微词。潦倒依书卷，峥嵘仗酒卮。最怜《文选》学，不解《说难》悲。（诗下原注：君刻书数十种，皆有考异，极精核。《文选》、《韩非子》，其二种也。）

诗见《柏枧山房诗集》卷四《夏日杂詠》。其时顾千里犹健在，梅氏不致误言。

李慈铭尝记载，庚申八月初十日，顾千里之孙河之避乱至苏州洞庭山，“因言家故贫，惟有书数万卷，皆其祖涧菴先生所藏善本，多有手校手写者。秘籍及宋元槧亦不下百余种。先生尝为鄱阳胡氏校刻《通鉴》及《文选》，《文选》尤最所致意。其《考异》一书，皆出先生，故家有藏稿，又有初印红字《通鉴》，真希世之宝也。”（《越縵堂日记》）此可谓确证。

此外，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著录：

《文选李善注》六十卷，附《考异》十卷。

范希曾《补正》云：“胡本《考异》十卷，顾广圻撰。

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亦著录：《文选李善注》六十卷，“胡果泉仿宋刊本，顾千里为《考异》十卷附之，即依淳熙辛丑尤延之贵池刊本。近世通行以此本为最善。”

当然，无须讳言，有的文献中，也有与此不尽相同的记载。钱泰吉《曝书杂记》卷上云：

胡公刻《通鉴》，《序》谓别撰《考异》。今所行本未见也。嘉庆十四年刻《文选》，有《考异》十卷，元和顾君广圻，镇洋彭君兆荪所撰。

彭兆荪《小谟觴馆文续集》卷一《与刘芙初书》载：

淳熙《文选》全帙已刊，近与桐菴的商榷《考异》，渠精力学识，十倍於蒙，探索研导，匪朝伊夕，凡诸义例，半出荆裁，间以黠浅补直

其阙。

但这也可证《文选考异》并非出自胡克家之手。达官显宦请他人代笔而署己名，此在乾嘉之际并非罕见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证，可以确定，现署名胡克家的十卷《文选考异》，并非胡氏所撰，而实为顾千里所作，至少是主要出於顾千里之手。

1982、9。

## 新发现的《永乐大典》两卷 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

北京图书馆新近入藏《永乐大典》一册（卷3518—3519），是多年调查所未及，各家著录所未见者。现由山东掖县社员捐献给国家，实是一重大收获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卷幅宏富、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类书。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三亿三千多万字。体例是以《洪武正韵》的韵目编排，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八千余种古书分门别类录入，成为“上自古初，迄于当世。旁搜博采，汇聚群分”的“奥典”。

《永乐大典》成书于明永乐年间，由解缙等奉谕编纂，又由姚广孝等纂修。明成祖朱棣赐名并亲撰序文。永乐六年（一四〇八年）冬正本缮写完成；嘉靖四十一年（一五六二年）世宗命人依上本另摹一部，是为副本。

明末，正本毁于失火，副本也于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入侵期间，几遭劫毁，少数幸存，或被掠至海外，或散落民间，据查，全世界所藏不过八百卷，仅为原书的百分之三强。

山东所捐此册《永乐大典》，为其字韵门制类卷三千五百一十八至三千五百一十九，全卷当为五十六页，现存三十九页零一残角。书目文献出版社已依此册原样影印出版，由北京图书馆服务社发行。

·社参·